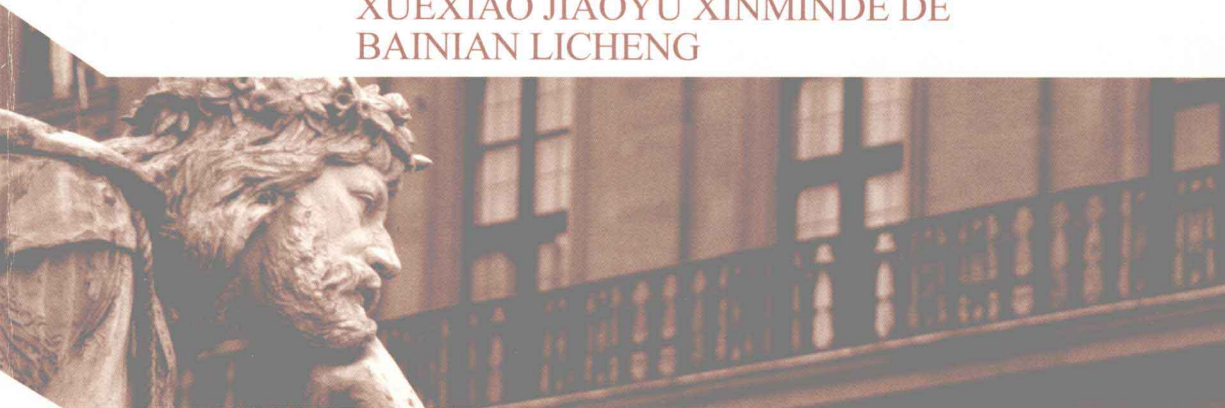


京師 道德教育论丛
JINGSHI DAODE JIAOYU LUNCONG

丛书主编：戚万学

学校教育“新民德”的 百年历程

XUEXIAO JIAOYU XINMINDE DE
BAINIAN LICHENG



本书试图在“国民性改造”思潮的框架内，立足于学校教育“新民德”的世纪进程，从影响学校德育的外部宏观社会环境因素出发，力图证明学校教育“新民德”离不开文化认同的思索、辩论，离不开社会教育、家庭教育的支持，更离不开国家政治民主、经济自由的推动。

陈 萍 ■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京師 道德教育论丛
JINGSHI DAODE JIAOYU LUNCONG

丛书主编：戚万学

学校教育“新民德”的 百年历程

XUEXIAO JIAOYU XINMINDE DE BAINIAN LICHENG



陈 萍 ■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学校教育“新民德”的百年历程 / 陈萍著. —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11

(京师道德教育论丛)

ISBN 978-7-303-13447-2

I. ①学… II. ①陈… III. ①学校教育—德育—研究
IV. ①G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93026 号

营销中心电话 010-58802181 58808006
北师大出版社高等教育分社网 <http://gaojiao.bnup.com.cn>
电子信箱 beishida168@126.com

出版发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cn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 100875

印刷: 北京外文印刷厂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本: 170 mm × 230 mm
印张: 14
字数: 245 千字
版次: 2011 年 11 月第 1 版
印次: 201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28.00 元

策划编辑: 郭兴举 责任编辑: 李 志
美术编辑: 毛 佳 装帧设计: 毛 佳
责任校对: 李 茵 责任印制: 李 啸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 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 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 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 010-58800825

总 序

道德教育的基本意义在于增进人的道德自由，培育人的道德智慧，提升人的道德福祉，前辈哲人无不为此孜孜以求，铢积寸累。然而随着现代性对古典心性的拆解，道德相对主义、道德虚无主义将道德本真撕裂为碎片，人类如何在此种精神境遇中重新建构德福一致的价值体系成为当前道德哲学乃至道德教育哲学最为核心的思想主题。一方面，道德是否可教的本体论难题亟待答复，另一方面，物质主义、功利主义的道德教育理念与制度构成也需要进一步的理性反思。而且，道德教育已经不再仅仅作为学校的一种职能，而是关涉由现代性催生的诸多争执。作为学校的一种职能，学校道德教育的原则与方法需要得到系统地反思与批判；作为解决现代性争执的可能方案，学校道德教育则需要提出新的改进策略，以引领社会风气的健康发展。学校道德教育能否应对价值多元与价值消解的挑战，并自觉参与现代性的道德救赎，已经成为学校道德教育的必然担当。

面对“古今之争”的精神张力，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道德文化已经不再仅仅作为一种历史资源，它所诉诸的人心秩序与道德制度建构业已成为当前现代性拯救的一个思想方案。古典心性与现代性的相遇构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巨大“文本”，为此所有有志于道德教育的思想者必须提出具有足够容量的思想框架，以应对经典重释与时代命题的双重挑战。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道德教育正遭遇着理论与实践的严峻挑战。文化的多元奔放，各种社会思潮的奔涌激荡，相对主义的不断蔓延，传统道德文化的时代承续，异域道德思想的民族转化，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与解决不仅关涉着当前道德教育能否摆脱困境，而且尤为重要的是关系到 21 世纪中国社会的道德前景和道德格局。

无论是令人担忧的社会道德生活状况，还是道德教育自身发展面临的窘境，抑或理论之独有魅力的吸引，都催逼着我们在这一领域去做新的探索，新的构思。正是基于我国道德教育研究之上述问题的焦虑，也源于对学术本

身的热情以及理性的真诚，才有了本套丛书的筹谋与勘定。本套丛书不惮以探询当代道德教育拯救之道作为自己理论上的努力，以图澄清当代道德教育之流弊、根源及改进之道，以用作对我们思考道德教育之深层问题的某种提示。面对层出不穷的道德教育问题，我们基于何种立场，采用何种方式探寻道德教育可持续发展的路径选择，不仅关涉我们以何种姿态来寻绎道德教育的时代意蕴，与时俱进地推进道德教育，而且对整个教育领域的改革和纵深发展，也将产生某种积极的影响。

由是，本套丛书的出版怀抱着这样一种实践追求：其意并非在于造就体系凿凿之道德教育理论，而在于以较为多元的视野重新审视道德教育研究的若干基本问题，追究道德教育之本然与应然，表达我们对道德教育的个体性见解。所以，编录诸文既有道德教育哲学的澄明思辨，亦有道德教育实践方法的理论考证；既涉及我国道德教育的古典气质，亦关注我国道德教育的现代性格。我们旨在通过不同风格、不同角度的较高学术性论辩，拷问道德教育何以及如何直击受教育者心灵的真谛。本套丛书亦秉持着这样一种理论情怀：以历史、逻辑、现实的对比论证为切入点，以反映目前国内道德教育理论研究的最新成果，推动我国道德教育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为宗旨，以充分的理论自觉，反映道德教育的新论点，着意道德教育理论与实践发展中诸多困惑的澄明，开阔视野，启迪思路，激发学界审思与建构道德教育理论的热忱，创生符合道德教育本义而又适合中国国情的道德教育理论及其实践。

本套丛书收录了八本专著（按拼音排序）：陈萍的《学校教育“新民德”的百年历程》、冯永刚的《制度道德教育论》、林海亮的《正面教育论》、刘丙元的《当代道德教育的价值危机与真实回归》、冉玉霞的《学校教育中的惩罚与学生发展》、唐爱民的《道德教育范畴论》、谭维智的《庄子道德教育减法思想》、叶飞的《现代性视域下的儒家德育》。每本专著的作者均为专事道德教育研究的青年才俊，有的业已在学界崭露头角，或在同仁中获得了某种认可。丛书的每一本著作均为作者在经历专门的学术训练与辛苦劳作后撰写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精修而成，均为道德教育某一领域或某一问题上的开拓、创新之作。诸才俊年轻敢为，葆有理论上的热情与勇气，大胆创新，观点犀利，才华初露，尽显青年学者们潜心道德教育研究事业的独特情怀；同时亦饱含学术上的尊重与虔诚，论证严谨，逻辑缜密，展示着徜徉道德教育研究这一艰深领域的理论魅力。当然，亦因年轻，恐不乏稚嫩，借本套丛书刊行

求教于专家、同仁，以得改进与鞭策。我们相信并期待，本套丛书对促进我国道德教育科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丰富道德教育研究的论域，能够产生积极的影响。

本套丛书的顺利出版，得益于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和社会各方人士的鼎力相助，策划编辑郭兴举博士更是为本套丛书的出版付出了大量心血，其认真负责的态度和辛勤的劳动为书稿增色颇多，在此一并表达我们真诚的谢意。

戚万学

2011年8月19日

于泉城·济南 谨识

目 录

CONTENTS

导 论	1
-----	---

第一章 我国学校教育“新民德”的提出	27
第一节 学校教育“新民德”提出的社会 背景和思想渊源	27
第二节 学校教育“新民德”提出的过程	34
第三节 学校教育“新民德”提出的意义	42

第二章 学校教育“新民德”的政治学分析	46
第一节 新民德的成就需要与之相适应的 社会制度环境和制度资源	46
第二节 中国民主进程的曲折与学校教育 “新民德”的扭曲	50
第三节 两类民主建设尝试与学校教育“新民德”	82

第三章 学校教育“新民德”的经济学分析	88
第一节 学校教育“新民德”与经济关系之研究	89
第二节 中国传统经济的近代演变及其对 学校教育“新民德”的影响	97
第三节 中国传统经济的近代演变对 学校教育“新民德”影响的例证	116

第四章 学校教育“新民德”的文化学分析	125
第一节 学校教育“新民德”需要社会心理和文化的认同	126
第二节 近代文化变迁及其对学校教育“新民德”的影响	133

第五章 总论：学校教育“新民德”的反思与展望	163
第一节 学校教育“新民德”的世纪反思	164
第二节 学校教育“新民德”：一个未完成的历史课题	183

结 语	192
------------	------------

主要参考文献	196
---------------	------------

后 记	214
------------	------------

在社会公共生活日益发达的今天，公德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无论是依照我国当前的社会现状，还是学者们的相关论断，公德的树立都可谓任重而道远。因此，研究中小学校公德教育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学术价值。

一、研究对象解析

为何要以“学校教育‘新民德’的世纪之梦”来命名学校公德教育研究？“新民德”与公德之间有何关联？这是本书首先需要回答的问题。研究表明：第一，公德于我国而言并非自然内生型的历史概念，它不是经济社会生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需要和产物，而是“舶来品”。根据陈弱水在其《公共意识与中国文化》^①著作中的研究，现代中国的公德观念是20世纪初从日本引入的。公德观念起自明治时期（1868—1912）的日本，公德一词可能最早出现于福泽谕吉（1834—1901）的《文明论概略》（1875年初版），随后，“公德”逐渐成为代表明治前二十年社会伦理意识的主要标志。到19世纪20世纪之交，日本出现了阐扬公德的热潮，在明治三十四年（1901）达至顶峰。当时，日本的公德观念大体包含三项要素：（1）不伤害不确定的他人以及公众的利益；（2）协助他人，并为公众创造利益；（3）为国家效力。前两项是公德的核心，后一项则为边缘，“公德”基本上是个社会性的观念，其集体主义的含义并

^① 陈弱水，公共意识与中国文化，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

学校教育「新民德」的百年历程

不明显，它主要是指个人对公共秩序及社会其他成员所应有的责任和爱心，即社会伦理或公益心。不过，初始引入我国（以致随后很长一段历史时期）的公德观念由于被期望承载救亡图存的使命而侧重“为国家效力”的一面，这种本末倒置、这种偏离应该为学校公德教育依然任重而道远负有很大责任；第二，公德最初被援引入我国，受到思想先驱的大力推崇，及至被纳入学校教育内容，均属“新民德”范畴的思想与活动——在当时的思想先驱们看来，国民道德之所以需要“破旧立新”，是因为中国传统道德重私德，轻公德，这导致中国一盘散沙、任人欺侮，所以救亡图存、国富民强急需加强公德的培养。简单地讲，“新民德”以培养国民“公德”（广义）为核心。

研究“新民德”，就无法绕开“新民”（也叫“改造国民性”或“国民性改造”）思潮。一个世纪前，当思想先驱们逐步对“人的现代化是现代化的关键”达成共识时，无数怀揣强国之愿的仁人志士，把“新民”作为推动中国近现代化进程的突破口，并且视学校教育为“新民”的重要途径。

二、研究内容的确定

“新民德”是“国民性改造”思潮的一个内容或说维度。在此意义上可以讲，学校教育“新民德”是“国民性改造”思潮框架内的思想与活动。因此，研究学校教育“新民德”，一要了解“国民性改造”思潮概况；二要进一步探讨“国民性改造”之一端“新民德”的内涵、特征及其与学校教育、尤其是学校德育观念与实践的联系。

（一）“国民性改造”思潮概述

1. 我国近代“国民性改造”思潮界定

“国民性改造”思潮（也叫“新民”思潮），是中国 20 世纪启蒙思潮的重要内容之一。一般认为，它酝酿于戊戌维新时期，在严复的著名政论文《原强》中首次明确将其界定为“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①，即“三民”思想；后继者梁启超 1902—1906 年《新民说》的发表可看做是其形成的标志。之所以这样认为，一方面，是该著作对近代中国改造国民性的理论依据、目标模式、实现途径给予了最完整的阐述；另一方面，从参与讨论的人数、传播的方式、讨论的内容等几个维度来审视，《新民说》发表的这一时期，对国民性改造问题

^① 严复．原强修订稿//王栻．严复集（第 1 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27．

的探索已达到了基本的社会思潮形态。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在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一批启蒙思想家的共同努力下，国民性改造问题的探讨才真正达到白热化阶段，成为社会学术焦点。

学术界关于国民性改造思潮的研究比较多。较已有的研究而言，本书关于国民性改造思潮的界定，有两个不同点：

其一，一般人研究的“国民性改造”思潮从时间跨度上来讲，往前可追溯到洋务运动时期，往后可延及五四运动前后。但笔者认为，“五四”时期并不是“国民性改造”思潮由爆发归于沉寂的时期，而是“国民性改造”思潮从相对单纯注重理论的宣扬转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阶段。因为“新民”的历史使命到五四时期并未完成，反而更显示出其必要性；同时，有识之士意识到“新民”的主要对象是全体中国人，而不应该仅仅只是少数文化精英；另外，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发展规律也告诉我们，“新民”理论发展到一定阶段，也需要实践检验。正因为如此，“新民”思潮发展到“五四”时期，就出现了以下两个方面的变化：一是“改造国民性”的统称逐渐被分解为更具体的口号，如文学领域的“改造文字以改造观念”，教育领域种种民主与科学教育思潮、“文字下乡”等；二是“改造国民性”的参与者由文化精英（理论创造与宣传者）逐渐下移至普通老百姓（接受改造）。所以说，“新民”或“改造国民性”的口号或许逐渐给人“偃旗息鼓”的印象，但实质上，“新民”思潮至今没有进入尾声……从严复的“三民”、谭嗣同的“新人”、梁启超的“新民”，到孙中山的老百姓“训政”，再到鲁迅的“改造国民性”、胡适的“改造文字以改造观念”、晏阳初的“除文盲，作新民”，一直到毛泽东的“斗私批修”“灵魂深处爆发革命”、邓小平的“四有”（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新人以及新的时代背景下中共中央颁发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等，其实都突显了改造国民性、提升国民素质的历史一贯性和时代特征。

其二，不少学者在对近代国民性改造思潮进行评价时，认为近代国民性改造思潮“表现出重德轻智的倾向，总是把更新民德、完善人格等视为国民性改造的核心，而把开发民智看得无足轻重”^①；甚至还有学者认为“重德轻智”是“新民”的历史使命还未完成的一个重要原因。笔者的观点与之恰恰相反：

^① 袁洪亮，人的现代化——中国近代国民性改造思想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47。

学校教育「新民德」的百年历程

事实上，近代国民性改造思潮中的“新民德”更多地停留在口头上。与“新民德”相比较，“开民智”更多地被付诸实践，国民文化科学素质的提高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重“新民德”只能算一个“假象”。这也是本书认为“新民德”还需花很大精力研究的一个重要原因。

2. 我国近代国民性改造思潮的主要内容

国民性改造思潮自产生以来，学术界围绕国民有哪些劣根性、怎样才是理想的国民，以及如何改造国民性等问题展开了讨论。

(1) 对中国国民性的认识与评价

“国民性”“民族性”“国民精神”“民族精神”等概念经常被当做同义语来使用，其意大概是指表现在一个国家或民族全体成员中的基于共同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社会政治制度而趋同的心理结构、价值取向、行为方式、风俗习惯、思维定式等，它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另一个民族的特性（也有人认为国民性是一个国家全体国民的共性，而不是区别于另一个民族的特性）。事实上，具体而言，这四个概念并不完全相同，它们各有侧重。应该说，“国民性”和“民族性”对于民族特性是优劣全包的，而“国民精神”和“民族精神”侧重指民族特性中的优秀成分。鉴于本书的重点并不在“国民性”概念的界定上，故权且将其作为日常概念。

沙莲香教授根据《中国民族性》（一）一书中所收集的 71 个人物、500 多个观点（1849—1986），在《中国民族性》（二）^①一书中将其粗略分成 8 类，然后根据统计每类观点出现的频率来了解历史上有关中国人研究的几个基本观点及其分布状态。统计结果表明：从每类观点在 71 个人物的主要著作中出现的频率看，第一位是勤劳节俭，安贫乐道，占 24.4%；第二位是自私自利，虚伪嫉妒，占 22.3%；第三位到第八位依次是：家族至上，权威主义（12.9%）；仁爱慈悲，反躬修己（11.6%）；笼统无知（8.5%）；中庸谦恭，圆熟含蓄（8.3%）；聪慧灵巧，自强不息（6.8%）；至大至刚，和平宽厚（5.2%）。然后，她又通过问卷调查的形式了解生活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社会改革不断发展这一社会环境中的现代人的观点，调查结果显示：被调查者对历史上主要观点的肯定评价占多数，而历史上为数不多的人所主张的观点“聪慧灵巧，自强不息”类和“至大至刚，和平宽厚”类，在问卷中却得到了为数众多的人的赞成。

^① 沙莲香．中国民族性（二）．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

事隔 20 年的今天，在中国社会改革开放比 20 世纪 80 年代又往前跃升了一大步的社会环境下，若再进行一次关于中国人的问卷调查。结果与历史上的观点、与 20 世纪 80 年代的观点相比，会不会有什么大的变化？笔者没有做具体的实证调查。不过，从 20 世纪 90 年代李宗吾所著并曾风靡一时的《厚黑大全》、刘智峰主编的《道德中国》、21 世纪初出版的易中天所著《闲话中国人》、解思忠著的《中国国民素质危机》、黎鸣著的《中国人为什么这么“愚蠢”》等著作中也许可见一斑，即多数学者对中国“现实的国民性”^①仍然很不满意，用《道德中国》一书中的原话来讲：当今中国人“什么都不信，什么都不怕，无尊无卑、无大无小、无规无矩、无法无天，除了功利得失，没有其他是非原则，整个国民精神趋向‘痞子化’”^②。

从沙莲香教授的归纳中可以看出“自私自利，虚伪嫉妒”“家族至上，权威主义”，以及“笼统无知”是改革开放前的中国人被公认的国民劣根性。其中，最受指责的前两项国民劣根性与道德问题重合：它们所包含或与之相关联的内容远远超出这四个词语的含义，可以具体化为许许多多“条目”，但归根结底就是国民公德的缺乏；改革开放后，批判国民公德缺乏的声音依旧不绝于耳。可以看出，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经济生活方式的转变，对国民公德缺乏的体认已经从最初的小部分志士仁人小团体扩展至广大民众。

关于认识和评价中国国民性，笔者认为，国民性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一个民族国家的文化，而每一种文化自身都是一个整体，相互关联，正反共存，对立统一。相应地，这些关系也同样反映在国民性方面。其一，中国国民性的许多方面往往相互关联，既彼此促进，又彼此制约。比如安贫乐道、吃苦耐劳、省俭撙节、知足常乐、听天由命、缺乏进取精神、缺乏竞争意识、缺乏创新精神、缺乏好奇心、爱好和平、坚韧能忍、适应力强、不求精确等；再比如家族至上、尊卑上下、欺软怕硬、窝里斗、保守、自私自利、虚伪欺瞒、口是心非、缺乏公德、缺乏独立精神、随大流等。其二，中国国民性的许多方面又常常正反共存，对立统一，有人称之为“双重人格”。如“重形式又好实际”，比如公园总爱设计成蜿蜒曲折的小路，但事实上，总有很多人宁愿“踩草坪”走直线（如果没有道德舆论的压力，走直线的人恐怕更多）；“自强不

① 郑欣森．文化批判与国民性改造．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9.

② 刘智峰．道德中国．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108.

息又听天由命”，正如林语堂在《中国人》中说，“中国人成功时都是儒家，失败时则是道家。”^①儒家建设奋斗，道家冷眼旁观，外加一声叹息“唉，都是命！”“麻木不仁又慈悲善良”，多少新闻报道歹徒行凶时，旁人视而不见，与此同时，任何受观众喜爱的影视剧中的角色，都有一个共性，那就是善良。“勤俭节约又铺张浪费”，试拿一般家庭平时的一日三餐对比婚丧嫁娶的宴席就一目了然，等等。由此看来，改造国民性应该首先从“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文化赖以生存的土壤着手，如经济基础（包括物质生产方式、分配方式、运行体制等）、政治制度，而不仅仅是表面的文化本身。

（2）理想国民的设计

思想先驱们对理想国民的设计建立在国民“有”和“无”的基础上。“有”是指有哪些国民劣根性需要根除；“无”是指对比时代要求看看中国人最缺乏哪些国民性。不同时期，围绕不同的时代主题，先驱们对理想国民的设计也不尽相同。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新民”的重点在“新国”。“亡国灭种”的压力迫使这一时期的思想先驱急切地去寻找中国社会积贫积弱的原因，最终将目光深入到国民人格的缺失和病态中。严复在对比中西国民性的基础上，得出当时“民力已荼，民智已卑，民德已薄”^②的国民素质现状，进而提出“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三民”主张。梁启超继承并发展了严复的“三民”主义，认为中国之所以贫弱不振，是因为中国人“愚陋、怯弱、涣散、混浊”。具体而言，他认为中国人有四大弱点：“爱国心之薄弱”“公共心之缺乏”“独立性之柔脆”“自治力之欠缺”。因而其代表作《新民说》通篇的主旨就在于塑造近代社会的理想人格形象“新民”——有国家至上的团体意识；自由、自治、进步、合群的公德意识；敢于进取、敢于冒险的竞争意识；维护权力、恪尽义务的法律意识等。可以看出，严复、梁启超“新民”的目标都是把封建专制束缚下的“臣民”转变成近代资产阶级国民。不过，这种“新民”强调的是其“群性”，即有利于民族主义的一面（极其强调爱国主义），相对忽略了个人的生命、价值、尊严等个性内容。

辛亥革命至五四运动时期，“新民”思潮发展到真正的“立人”阶段。以鲁

① 林语堂．中国人．上海：学林出版社，2001：67．

② 严复．原强修订稿//王栻．严复集（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18—21．

迅、陈独秀、李大钊、胡适、晏阳初等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家，一方面致力于抨击封建传统文化对人性的残害、桎梏，控诉“吃人”的封建“礼教”，如陈独秀认为：中国所以受屈于西方列强，根本原因在于抵抗力的缺乏，而这又要归咎于中国封建传统文化的毒害，“老尚雌退，儒崇礼让，佛论空无……”^①只要中国处于这种文化的统治之下，中国就永远不会有强大之日；鲁迅更是痛斥造成中国国民麻木、奴性、愚昧、迷信、怯弱等的封建等级文化。另一方面，他们主张以资产阶级启蒙思想中的科学、理性、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等精神来塑造独立个体，并且在道德上提倡“合理利己”主义和“个人本位”主义，达到“立人”的目的，认为“人立而后凡事举”。这在中国历史上首次确立了以人为出发点和最终价值尺度的国民性改造的思想基点。

新中国成立前后至改革开放前，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创造性地建构了无产阶级的国民形象——具有阶级意识的无产阶级新人，“又红又专”，以革命的集体主义价值观为基本的价值取向，体现着团结、互助，以及乐观向上的“红太阳”精神。这一时期的“国民性改造”思想围绕“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代命题，以“阶级斗争”为纲，着重解决个体与集体、物质与精神的相互关系。

改革开放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根据国情，提出了与“大力发展生产力”的经济方针相适应的“新人”理想，即“四有”（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新人，希望在借鉴西方先进的物质文明的同时，能够抵制西方资产阶级“自由化”等腐朽思想的侵害。

当前，在改革开放已过30年的今天，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尚不完善，在“大力发展生产力”的过程中，获利取得了价值评价优先权，整个社会都处在一种博弈之中，基于博弈论而建立的交往理性希冀用小成本来获取道德上的“善”，个人应当承担的责任成为一种建立在成本——收益模型上的社会经济学，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成为一种检测有用性的功利主义诉求。出于对这种片面发展的“单向度的人”补偏救弊的需要，“全面和谐发展的个体”被提出作为今天的理想国民形象。

（3）改造国民性的方法与途径

提出“新民”的目标还只是“新民”的前提，关键是用何种方法来达到这些

^① 陈独秀：抵抗力//独秀文存，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25。

学校教育「新民」的百年历程

目标。在这个方面，思想先驱们进行了积极可贵的探索。宏观层面，不少有识之士主张改革政治制度；中观层面，思想先驱们主张办报新民、文艺新民、教育新民等。其中，教育新民被作为一条极其重要的途径。

教育新民。从“戊戌维新”时起，思想先驱主张中国的传统教育必须“改弦更张”，科举制度必须废除，同时，他们主张引进西方教育制度，认为只有此举才是培养有用之才的唯一途径。与此同时，教育领域的有识之士也都积极响应“新民”的历史号召，将“新民”的理论付诸实践。一时之间，“以教育自任，以开化为职，播革命之种子，涌独立之风潮”^①的学校、学堂、夜校、公共讲堂等纷纷成立，蔚为壮观。随后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1912年新学制的正式颁布、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平民教育思潮”、20世纪80年代“义务教育”的大力推行、20世纪90年代“素质教育”的勃兴等，都是“教育新民”的举措。

办报新民。梁启超曾道：“报馆者，国家之耳目也，喉舌也，人群之镜也，文坛之王也，将来之灯也，现在之粮也。”^②他还指出报纸的作用主要有两点：“一曰对于政府而为其监督者，二曰对于国民而为其响导者。”^③报刊作为近代以来的一种重要舆论宣传工具，一方面可以培养国民关心时政的参与意识；另一方面能够通过有选择性的内容呈现，以及有引导性的价值评判，“潜移默化”地改造国民的思想。因此，严复、章太炎、梁启超等都曾对办报投入极大的精力，如《清议报》《新民丛报》《东方杂志》《新青年》等，都是不同时期改造国民性的阵地。当然，办报需要以启动平民的“文字教育”工程为前提，否则容易流于少数“精英”的运动形式。这方面不是没有教训的。

文艺新民。小说、民谣、戏剧、诗歌、电影等作为大众喜闻乐见的娱乐形式，也曾被充分利用起来改造国民性。小说“源于生活，高于生活”——选取群众身边的、为群众所熟悉的素材，再现“百姓日用而不自知”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在讽刺或讴歌他人他事的同时，能够促人对照反省；民谣、诗歌等直接把大众的好恶以朗朗上口的语言形式抒发出来，要么如诉衷肠，要么引吭呼唤。其特点是爱憎分明、流传快、感染力强、号召性强，

① 刘增合。二十世纪初趋新社群对国民性问题的关注。江西社会科学，1998(2)。

② 梁启超。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饮冰室合集·文集之6。上海：中华书局，1936：49。

③ 梁启超。敬告我同业诸君//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36。

经其引导容易形成强大的合力(凝聚力),如国歌;戏剧和电影,因其表演的生动性,能将现实生活中的黑暗和丑恶集中、放大,“赤裸裸”地揭露其“真面目”,达到辛辣讽刺的效果;同时,也能将现实生活中的光明和美好“复印”,然后到处散播,起到鼓舞人心的作用。

除上述这些主要的“外塑”形式外,还有梁启超曾提出的“内省”法。梁启超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他认为,“自新”是“新民”的一个重要途径,即内修而成新民。正如《“大学”》曰:作新民,能去其旧染之污者谓之自新,能去社会旧染之污者谓之新民。若是者非悔末由。悔也者,进步之原动力也”。据此,梁启超认为:“新民云者,非新者一人,而新之者又一人也,则在吾民之各自新而已。”^①

值得注意的是,改造国民“劣根性”不可能把国民愚昧、保守、不思进取、狭隘、自私自利等一条条“罪状”单独删除,而需要用新的内容来取代旧有的位置。这也称之为有“破”有“立”。

3. 对近代我国国民性改造思潮的反思和评价

国民性改造思潮发起于国难当头的危机时刻,其初衷在于救亡图存,富国强民,也就是说其出发点是一种积极强烈的爱国主义。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焦点上凝聚着两个课题:作为客体的政治经济结构的近代化和作为主体的文化心理结构的近代化(即人的近代化),这是一个双重近代化的过程。一个世纪之后的今天,当我们作为20世纪差点沦为“亡国奴”的中国人的后代,能够从容坐而论道,已经多少说明了“新民”思潮的进步意义:中国没有亡国灭种!虽然这个成果并不是“新民”思潮的“独家”功劳,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的失败,已经从反面证明:没有“新民”是万万不行的。因此,从“新民”思潮的初衷来看,其社会进步意义不容否认。

其一,“新民”思潮是一种追求人的近代化的进步思潮,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国民素质。它是以近代工业文明取代传统农业文明,从而改造中国人传统行为方式和社会心理结构的思想启蒙运动。

其二,“新民”思潮引发了近代知识分子对于封建文化传统的深刻反省,同时发挥了巨大的启蒙作用,促进了中国人的近代化。中国的近代社会变革

^① 梁启超.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中国启蒙思想文库(新民说).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3.